

政策支持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基于制度视角的实证研究

张宸妍¹，郑 玮²，洪俊杰²

(1.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经济学院, 北京 100070;

2.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北京 100029)

摘要: 本文通过梳理 1989—2013 年实施的对外直接投资便利化相关的中央和省级政策文件, 匹配 2004—2013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 实证研究了政策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 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的政策支持均能促进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省级政府的相关政策能进一步加强中央政策支持的促进作用; 当企业隶属较高的政府层级时, 省级政策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削弱; 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区域, 中央和省级的政策对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更加明显。本文验证了提升投资便利化水平的政策支持具有积极的经济效应, 为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提供了政策思路。

关键词: 政策支持; 便利化政策; 对外直接投资; 制度视角; 中央政府; 省级政府

[中图分类号] F74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4034(2022)03-0034-17

引 言

对外直接投资是推动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2020年7月30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部署。推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一环。在此过程中, 如何围绕“走出去”战略, 有效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 以“走出去”战略为核心的对外投资政策促进体系是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保障, 其中便利化政策直接决定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制度成本。不同地区会依据地方经

[收稿日期] 2021-10-21

[基金项目]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北京市属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XRZ2022047)

[作者简介] 张宸妍(1994—), 女, 山东肥城人,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 对外直接投资; 郑玮(1990—), 女, 河北沧州人,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 非市场战略; 洪俊杰(1976—), 男, 安徽黄山人,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国际贸易与国际商务

济发展情况和中央政策制定相应的省级便利化政策，而这一举措在地区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在新时代纵向政府职责体系建设的背景下，本文将从中央政府、省级政府的角度，通过便利化政策理清政策支持的影响，为全面理解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行为和后续政策的制定提供借鉴和参考。

现有国际商务理论认为，自身优势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Dunning, 1977; Helpman 等, 2004）。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往往不具备绝对的竞争优势，部分生产率较低的企业也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戴翔, 2013）。政策引导对企业国际化行为的影响不容忽视（Buckley 等, 2007; Gaur 等, 2018; Luo 等, 2010; Wang 等, 2012）。政府通过颁布新的政策、修正已有政策、废止无效政策等方式推动、规范、监管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张为付, 2008）。这一特殊性使其区别于传统的国际商务理论，因而更值得关注。

制度视角在理解新兴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Cui 和 Jiang, 2012）。关于母国制度环境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研究，大量文献从制度促进视角（Lu 等, 2014）和制度逃逸（Luo 和 Tung, 2007; Luo 等, 2010）等角度，探究母国制度环境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政策支持与保护是母国制度环境的重要表现，财政、保险等政策有助于降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融资成本（王碧珺等, 2015; 杨恺钧和胡树丽, 2013），国家信贷政策对企业去风险较高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解释力（陈岩等, 2012）。试点地区行政审批的简化会降低对外直接投资固定成本，从而促进更多企业参与对外直接投资（曾守桢和余官胜, 2020）。已有研究聚焦于信贷政策、审批核准政策等，考察政策支持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缺乏对便利化政策组合、不同层级政府发布政策的作用及其关联性的探讨。

本文从审批核准、外汇管理和信息支持等方面，整理了中央政府颁布的便利化政策和相关的省级便利化政策，依据政策的有效时间、适用范围和发布地区，匹配2004—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名录，从企业层面系统考察政策支持对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机制。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基于中国的特殊制度背景，首次利用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发布的便利化政策考察政策支持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第二，讨论省级便利化政策和中央便利化政策的交互作用，关注政策协调性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完善制度的内在作用机制。第三，综合考虑企业和地区层面的特有因素，从企业隶属层级、地区市场化程度的角度分析便利化政策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机制。

一、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说

（一）便利化政策与对外直接投资

制度基础论（Institution-based View）认为制度环境是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需要遵守的“游戏规则”（rule of game）。“制度促进”观点的提出为理解新兴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提供了一个更好的途径，这一视角强调政府参与能够促进

企业的国际化 (Luo 等, 2010)。政府制定的便利化政策体现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内软环境, 是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企业要想“走出去”, 必须要获得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以下简称国家发展改革委) 或省级发展改革部门出具的核准文件或备案证明, 以及商务部或省级商务主管部门颁发的《企业境外投资证书》, 同时获得国家外汇管理局的许可。因此, 上述部门发布的有关政策文件, 成为企业申请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依据。

鼓励性政策作为政府目标的载体, 有力地促进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投资便利化的措施不仅推动了规模较大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也使得规模较小、生产率较低企业获得了投资成本下降的红利 (Hong 等, 2015)。地区性的政策措施作为特殊的制度性优势, 为目标企业提供了获取额外资源的途径 (Buckley 等, 2007)。例如, 政府部门在全面实施程序简化、权限下放之前, 往往选取部分地区作为试点。

在进入市场时, 企业可能受到东道国严格的审查和管制; 在经营过程中, 由于投资环境的不确定性, 企业会面临经济风险、自然风险等因素造成的损失 (姜广省和李维安, 2016)。考虑到这一因素,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和积极性会受到抑制。对此, 政府颁布相关便利化政策, 根据东道国的政治稳定性和风险等级, 下放对外直接投资的核准权限, 辅助企业决策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 另一方面, 建立经营障碍报告制度、安全风险预警制度等, 掌握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遇到的投资壁垒和风险事件, 帮助企业寻求解决途径, 提高待投资企业的投资积极性。由此, 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1:

假说 1 中央和省级政府颁布的便利化政策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二) 省级便利化政策与中央便利化政策间的协同

省级便利化政策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和中央政府一致的政策给企业正向的激励, 促使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Buckley 等, 2007)。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 中央政府发挥主导作用, 各项规定密集度高, 功能细分显著, 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创造便利化的国内环境。而省级政府发布的便利化政策的原创性内容相对较少, 一般是在体现改革节点的中央政策基础上加以延伸, 以强化中央政策的作用 (Luo 等, 2010)。省级政府作为跟随者, 主要负责落实和补充中央政府政策, 其跟进政策关乎中国地方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中央政府将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的核准等权限逐步交给省级政府, 使得省级政府掌握了对区域内部对外直接投资的自主裁量权 (曾守楨和余官胜, 2020)。在经济竞争考核与官员个人升迁的激励下, 省级政府会采取不同的中央政策执行策略, 部分省级政府及时跟进, 细化中央政策中的地方核准等程序; 而部分地区省级便利化政策缺位, 无法从政策层面推断地区对中央政策的实施情况。省级政府发布的便利化政策对当地企业来说是一种优势资源, 效率较高、对企业“走出去”持积极态度的省级政府能够及时跟进中央政府政策, 降低企业熟悉制度规则的成本, 传递正向激励。相反, 部分地区没有发布与中央一致的政策, 可能导致企业熟悉制度环境的成本较高, 不利于提高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积极性。由此, 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2:

假说2 省级政府颁布的便利化政策与中央便利化政策相互协同,加强中央便利化政策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三) 企业隶属层级的调节作用

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是制度和组织动态交互的结果,政策支持与微观企业资源形成互动,使企业在决策时,不仅需要考量自身的发展目标,还要有效利用隶属层级的资源约束(陈岩等,2012)。隶属层级较高的企业,规模普遍较大,自身具备进一步扩张、实现国际化的动机和能力。相比之下,隶属层级较低企业更依赖政策的扶持和引导。地方政府对隶属层级较低的企业具有更强的监管职能,更可能将“走出去”的政策目标内化于企业决策中,通过隶属关系强化政策性指引从而促进企业实施国际化战略。因此,隶属的政府层级不同,企业面临的制度环境存在差异,相比于隶属层级较高的企业,中央或地方推行的便利化政策对于隶属层级较低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更加显著。由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3:

假说3 隶属层级低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受便利化政策的影响更大。

(四) 市场化程度的调节作用

市场化程度体现了地区差异化的竞争机制,是企业外部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臧成伟,2017)。便利化政策以简政放权为核心,通过减少政府的干预,引导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依赖于地区市场环境发展程度,便利化政策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存在差异。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市场功能完善,信息的流动性更强(Hong等,2015)。企业能够及时接收和掌握中央、地方便利化政策的变化,从而能有效地利用政策优势,使便利化政策的作用得到增强。反之,如果地区市场化机制不健全,自上而下的信息传递存在障碍,影响企业对于地区制度的理解和掌握,不利于便利化政策发挥作用。同时,市场化程度的加深有利于改善资源配置,提高地方经济的整体运行效率(樊纲等,2011)。市场化程度与制度因素相互作用,影响着经济运行和社会交互,由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4:

假说4 地区市场化程度越高,便利化政策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越强。

根据以上研究假说,本文的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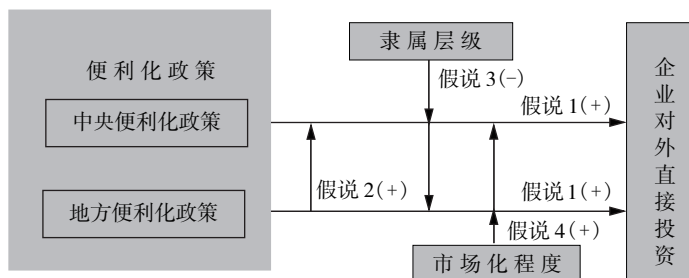


图1 理论框架

二、便利化政策与特征事实分析

(一) 中央便利化政策

中央便利化政策经历了从限制到支持、鼓励的转变过程 (Sauvant 和 Chen, 2014)。商务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主要负责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的审批、核准。2003年,商务部发布《关于做好境外投资审批试点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文件指出在北京、天津、上海等省市试点,简化审批程序、下放审批权限。2004年发布的《关于境外投资开办企业核准事项的规定》中,用核准取代审批。2009年的《境外投资管理办法》进一步简化项目核准程序,下放核准权限。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企业境外投资项目核准的管理办法主要有2004年实施的《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和2011年实施的《关于做好境外投资项目下放核准权限工作的通知》。相比2004年,2011年省级发展改革部门可以核准的项目投资额上限得到明显提高。2013年后,备案制逐渐取代审批制和核准制,成为主导。

外汇管理政策包括境外投资汇回利润保证金和外汇资金来源审查两部分,由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制定。1989年,汇回利润保证金制度建立,用于管控境外投资项目;2002年,这一制度被取消。1993年发布的《境外投资外汇风险及外汇资金来源审查的审批规范》强调对境外投资项目的严格审查。2002年,设立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改革试点;2007年,审查权限的下放扩展至全国;2009年,取消外汇审查制度。

东道国的投资环境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具有重要影响。对此,2004年印发的《国别投资经营障碍报告制度》鼓励跨国企业报告海外投资环境障碍和风险、投资壁垒等,并计划针对相关问题通过高层互访等途径进行磋商。2010年8月,出台《对外投资合作境外安全风险预警和信息通报制度》,敦促各部门收集、整理、分析和评估境外政治风险、经济风险、政策风险等信息,及时向境外投资企业发布预警。

(二) 省级便利化政策

对于中央政府发布的便利化政策,省级政府通过转发、细化的方式跟进。例如,在外汇管理方面,根据中央政府在2002年发布的设立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改革试点的政策,广东、福建和北京的外汇管理部门相继发布地方的《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改革试点办法》。关于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的核准,安徽、河北、重庆、陕西、四川、青海、新疆、广西、甘肃、江西、山东、北京、上海、江苏等地区的省级主管部门依次发布《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的跟进政策,重申中央便利化政策文件中的规定。便利化政策发展脉络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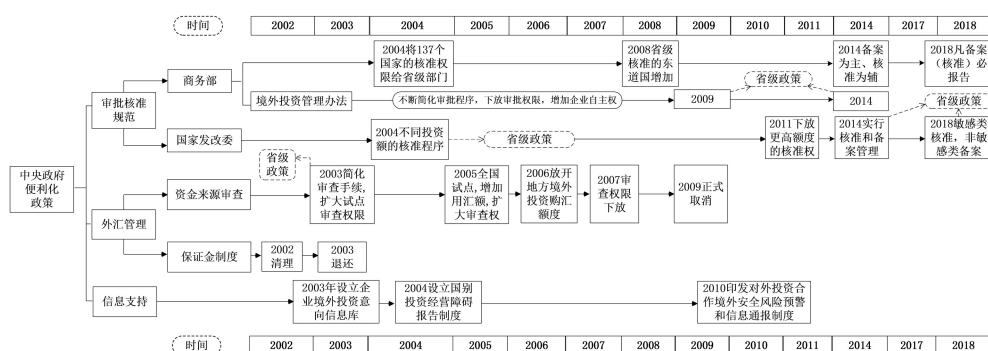


图2 便利化政策发展脉络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所得

三、数据来源与实证模型构建

(一) 数据选取

本文所使用的企业数据来自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根据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增长率，结合数据可得性，选取2004—2013年为研究时间跨度。参照 Brandt 等（2012）的方法匹配工业企业数据库，将其与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基于企业名称横向合并。本文收集整理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外汇管理局官方网站发布的便利化政策，以及在北大法宝数据库以“境外投资”“对外投资”等为关键词检索出来的省级主管部门发布的便利化政策，根据政策的实施时间，在2004—2013年，有效力的中央便利化政策文件41份，省级便利化政策文件34份。

(二) 实证模型及变量定义

本文的研究目的之一在于考察中央和省级政策支持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在理论机制的基础上，采用线性概率模型，回归方程如下：

$$\Pr [OFDI_{ijkt} = 1] = \Phi (\beta_1 CGP_{ijkt} + \beta_2 LGP_{jt} + \beta_3 Affiliation_{ijkt} + \beta_4 Marketization_{jt} + \delta_s X_{ijkt} + \alpha_i + \gamma_j + \lambda_t + \tau_k + \varepsilon_{ijkt}) \quad (1)$$

式（1）中，下标 i 代表企业， j 代表省份， t 代表年份， k 代表行业。被解释变量 $OFDI_{ijkt}$ 表示位于省份 j 属于行业 k 的企业 i 在 t 年是否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如果企业在统计年份及之前有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该变量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CGP_{ijkt} 是核心解释变量之一，刻画了在 t 年适用企业 i 的中央政策数量，根据政策的实施时间和失效时间，本文使用每年有效政策的个数^①，其中上半年实施的政策计入当年有效政策，下半年实施的政策则在下一年计为有效政策。按照政策列示的省份、行业、所有权以及实施年份、失效年份，匹配微观企业数据。另一核心解释变量 LGP_{jt} 表示省级政府 j 是否实施了和中央一致的政策，因为省级政府发

^①彭纪生等（2008）使用政策数量对政策进行测量。

布的便利化政策文件较少，如果统计年份中企业所在省份存在有效的省级便利化政策，则该变量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Affiliation_{ijkt}$ 为企业隶属层级，根据企业隶属的政府层级构建，企业隶属层级越高，该变量取值越大，当企业隶属于中央、省、市、县和其他时，该变量分别取值“5”、“4”、“3”、“2”和“1”。 $Marketization_{jt}$ 是地区市场化程度，使用樊纲等（2003）开发的市场化总指数衡量，回归时对变量 CGP 和 $Marketization$ 进行中心化处理。

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用 X_{ijkt} 表示，具体包括：（1）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Productivity$ ），采用 Levinsohn 和 Petrin（2003）的方法衡量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生产率高的企业具有较强的动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2）企业规模^①（ $FirmSize$ ），采用企业年末从业人数衡量，规模大的公司有更多资源用于对外直接投资。（3）企业年龄（ $FirmAge$ ），根据统计年份和企业成立年份的差值得到企业年龄变量，存活时间越长的企业，其对外直接投资可能性越大。（4）国有企业（ Soe ），对于国有企业，该变量取值“1”，否则取值“0”。（5）外资企业（ $Foreign$ ），与 Soe 处理方法相同。（6）出口情况（ $Export$ ），企业出口额大于零时，该变量取值“1”，否则取值“0”。

表 1 给出了上述变量的简要统计描述。

表 1 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描述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OFDI$	是否对外直接投资	2 273 848	0.005 0	0.070 7	0	1
CGP	中央发布的便利化政策个数	2 273 848	19.342 4	3.024 7	12	29
LGP	省级政府是否发布了和中央一致的政策	2 273 848	0.576 5	0.494 1	0	1
$Affiliation$	企业隶属于中央、省、地区、县、其他	2 273 848	1.248 4	0.712 6	1	5
$Marketization$	樊纲市场化程度总指数	2 273 848	7.793 3	1.574 9	-0.3	10.92
$Productivity$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2 273 848	7.231 3	3.352 1	-4.718 3	19.341 5
$FirmSize$	企业雇佣人数（万人）	2 273 848	0.029 4	0.126 4	0.000 1	21.707
$FirmAge$	企业成立年数	2 273 848	8.886 8	8.867 7	0	413
Soe	是否属于国有企业	2 273 848	0.106 6	0.308 6	0	1
$Foreign$	是否属于外资企业	2 273 848	0.274 4	0.446 2	0	1
$Export$	是否有正的出口额	2 273 848	0.233 5	0.423 1	0	1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整理。

四、实证检验和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根据线性概率模型的设定，表 2 报告了控制企业、年份、省份和行业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表 2 第（1）列为基准模型，包括中央便利化政策变量、作为调节变

^①为了方便展示报告回归结果，将企业规模变量作除以 10 000 的处理。

量的隶属层级和市场化程度、所有控制变量,结果显示,中央便利化政策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中央便利化政策的支持会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随着政策文件数量的增加,政府的支持力度加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提高。第(2)列进一步加入省级便利化政策,结果显示省级便利化政策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省级便利化政策也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影响因素,假说1得到支持。

表2第(3)列在第(2)列的基础上加入中央便利化政策和省级便利化政策交互项,重点关注中央、省级便利化政策的协同作用。实证结果显示,中央便利化政策和省级便利化政策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由此可证实省级便利化政策能够加强中央便利化政策对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支持了假说2。

表2第(4)和第(5)列考察隶属层级的调节效应。第(4)列在第(2)列的基础上加入中央便利化政策和隶属层级的交互项,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隶属层级低的企业,中央便利化政策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更加明显。第(5)列在第(2)列的基础上加入省级便利化政策和隶属层级的交互项,系数也显著为负,表明对于隶属层级较高的企业,省级政府的作用有限,因而隶属层级会负向调节省级便利化政策的影响。企业隶属层级越高,政府的参与程度越高,能够获得的资源支持和制度保护力度越大,省级政府发布的显性政策反而不容易表现出较大的作用。而隶属层级低的企业,依赖显性政策的支持和引导,省级便利化政策发布之后,资源通过市场渠道公开配置,隶属层级越低的企业,越能从省级便利化政策中获得充分的激励。第(4)和第(5)列的结果表明隶属层级低的企业受便利化政策的影响更大,证实了假说3。

表2第(6)和第(7)列考察市场化程度的调节效应。根据假说4,地区市场化程度会正向调节便利化政策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在第(2)列的基础上,第(6)列加入的中央便利化政策和市场化程度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第(7)列在第(2)列的基础上加入省级便利化政策和市场化程度交互项,结果显示该交互项系数也显著为正。这表明在市场化程度深入的省份,中央便利化政策、省级便利化政策对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强,假说4得到证实。第(8)列是包含所有变量以及交互项的检验模型。

考虑其他控制变量的影响,隶属层级变量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企业隶属层级越高,政府干预程度越强,影响企业战略的独立决策,降低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姜广省和李维安,2016)。市场化程度变量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市场化进程深入的地区,企业在本土成长面临的约束较少,对外直接投资的倾向性较低。整体上看,生产率越高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能性越大。企业规模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值,表明企业规模越大,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概率越高。经营年限较长的企业,通常具备更充足的经验,有助于实现国际化战略,因此企业年龄同样能显著促进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Hong等,2015)。与出口额为零的企业相比,具有正的出口交货值,能够加强企业和东道国之间的联系,有助于企业获取国外信息,从而提高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能性(Buckley等,2007)。国有企业变量的估计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说明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之间的对外直接投资倾向没有表现出明

显差异。以往研究中外资企业多倾向于对外直接投资，但是在表2中，外资企业的估计系数在第(4)列和第(8)列显著为正，其他模型中并不显著。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项目	(1)	(2)	(3)	(4)	(5)	(6)	(7)	(8)
<i>CGP</i>	0.094 2*** (38.333 6)	0.094 5*** (38.453 5)	0.094 4*** (38.453 9)	0.111 0*** (42.024 2)	0.095 3*** (38.716 1)	0.094 9*** (38.581 8)	0.094 6*** (38.497 8)	0.110 7*** (41.976 5)
<i>LGP</i>	—	0.006 5*** (15.577 3)	0.006 5*** (15.594 2)	0.007 5*** (17.591 1)	0.013 0*** (18.585 7)	0.007 1*** (16.293 3)	0.005 2*** (14.506 6)	0.007 1*** (10.921 3)
<i>CGP</i> × <i>LGP</i>	—	—	0.000 1** (1.990 3)	—	—	—	—	0.000 1*** (3.563 4)
<i>CGP</i> × <i>Affiliation</i>	—	—	—	-0.001 9*** (-39.878 2)	—	—	—	-0.001 8*** (-38.874 4)
<i>LGP</i> × <i>Affiliation</i>	—	—	—	—	-0.005 4*** (-12.893 6)	—	—	-0.000 4 (-0.803 5)
<i>CGP</i> × <i>Marketization</i>	—	—	—	—	—	0.000 3*** (17.971 7)	—	0.000 0 (1.490 0)
<i>LGP</i> × <i>Marketization</i>	—	—	—	—	—	—	0.002 0*** (14.772 2)	0.001 2*** (9.813 8)
<i>Affiliation</i>	-0.005 4*** (-19.631 3)	-0.005 5*** (-20.018 1)	-0.005 5*** (-20.021 2)	-0.006 9*** (-23.909 4)	-0.002 4*** (-7.062 0)	-0.005 5*** (-19.905 7)	-0.005 5*** (-19.952 2)	-0.006 6*** (-17.838 3)
<i>Marketization</i>	-0.000 7*** (-3.488 6)	-0.001 4*** (-6.403 3)	-0.001 3*** (-6.310 2)	-0.001 0*** (-4.838 1)	-0.001 4*** (-6.672 5)	-0.000 8*** (-3.603 6)	-0.002 2*** (-9.695 3)	-0.001 5*** (-6.629 1)
<i>Productivity</i>	0.000 1 (0.872 1)	0.000 2* (1.672 5)	0.000 2* (1.700 7)	-0.000 1 (-0.639 4)	0.000 2* (1.650 4)	0.000 4*** (2.831 3)	0.000 3** (2.208 7)	-0.000 0 (-0.121 1)
<i>FirmSize</i>	0.012 3** (2.393 5)	0.012 3** (2.396 1)	0.012 3** (2.395 7)	0.011 6** (2.289 0)	0.012 2** (2.384 4)	0.012 2** (2.378 8)	0.012 3** (2.394 5)	0.011 6** (2.287 1)
<i>FirmAge</i>	0.000 1** (2.426 5)	0.000 1** (2.451 3)	0.000 1** (2.438 0)	0.000 0 (1.149 9)	0.000 1** (2.267 8)	0.000 1** (2.165 9)	0.000 1** (2.480 1)	0.000 0 (1.136 6)
<i>Soe</i>	-0.000 2 (-0.332 0)	-0.000 1 (-0.165 6)	-0.000 1 (-0.178 5)	-0.000 6 (-0.858 5)	-0.000 2 (-0.333 9)	-0.000 1 (-0.165 6)	-0.000 1 (-0.148 4)	-0.000 6 (-0.868 0)
<i>Foreign</i>	0.000 0 (0.060 4)	0.000 1 (0.113 4)	0.000 1 (0.117 0)	0.002 3*** (3.134 3)	0.000 2 (0.299 3)	0.000 4 (0.583 8)	0.000 2 (0.296 4)	0.002 4*** (3.243 3)
<i>Export</i>	0.004 3*** (17.983 6)	0.004 3*** (17.976 4)	0.004 3*** (17.832 9)	0.004 0*** (16.594 3)	0.004 3*** (17.723 0)	0.003 8*** (15.602 6)	0.004 2*** (17.469 8)	0.003 8*** (15.779 4)
常数项	0.019 8*** (16.907 1)	0.015 5*** (13.053 4)	0.015 4*** (13.014 4)	0.020 2*** (16.873 5)	0.011 8*** (9.772 7)	0.013 9*** (11.582 5)	0.015 6*** (13.124 4)	0.019 7*** (15.917 6)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2 273 848	2 273 848	2 273 848	2 273 848	2 273 848	2 273 848	2 273 848	2 273 848
调整的 R ²	0.566 7	0.567 1	0.567 1	0.570 0	0.567 3	0.567 3	0.567 2	0.570 0
Within R ²	0.047 3	0.048 1	0.048 1	0.054 5	0.048 6	0.048 6	0.048 5	0.046 4

注：***、**和*分别表示估计系数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纠正了异方差后的t统计量。作者基于Stata15软件估计。下表同。

(二) 稳健性检验

1. 改变中央便利化政策衡量方法

不同政策文件传递出的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支持程度的信号可能不同,为了进一步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文本分析 TF-IDF 方法(洪俊杰和张宸妍,2020)衡量中央便利化政策支持力度,取代政策个数的衡量方法。表3第(1)至第(8)列的模型设定分别对应表2的第(1)至第(8)列,回归结果显示,中央便利化政策仍然显著影响对外直接投资,中央便利化政策和省级便利化政策的交互项系数符号不变,中央便利化政策和隶属层级的交互项仍显著为负,地区市场化程度显著正向调节便利化政策的作用,本文所有研究假说得到进一步证实。

表3 稳健性检验:改变中央便利化政策衡量方法

项目	(1)	(2)	(3)	(4)	(5)	(6)	(7)	(8)
<i>CGP</i>	0.048 2*** (36.503 5)	0.048 3*** (36.616 7)	0.048 3*** (36.603 5)	0.061 0*** (41.613 7)	0.048 8*** (36.862 7)	0.048 7*** (36.792 5)	0.048 4*** (36.662 0)	0.060 8*** (41.540 7)
<i>LGP</i>	—	0.006 4*** (15.268 5)	0.006 4*** (15.372 1)	0.006 8*** (16.155 3)	0.012 6*** (18.048 7)	0.006 3*** (15.178 4)	0.005 1*** (14.181 6)	0.004 8*** (7.525 0)
<i>CGP</i> × <i>LGP</i>	—	—	0.000 1*** (3.785 9)	—	—	—	—	0.000 1*** (3.904 6)
<i>CGP</i> × <i>Affiliation</i>	—	—	—	-0.001 2*** (-37.746 6)	—	—	—	-0.001 1*** (-36.882 9)
<i>LGP</i> × <i>Affiliation</i>	—	—	—	—	-0.005 2*** (-12.434 2)	—	—	0.001 1** (2.484 2)
<i>CGP</i> × <i>Marketization</i>	—	—	—	—	—	0.000 2*** (18.184 7)	—	0.000 0** (2.424 0)
<i>LGP</i> × <i>Marketization</i>	—	—	—	—	—	—	0.002 0*** (14.569 6)	0.001 1*** (8.743 0)
常数项	0.027 9*** (22.136 0)	0.023 6*** (18.714 1)	0.023 5*** (18.592 8)	0.033 7*** (25.634 2)	0.020 3*** (15.860 9)	0.022 0*** (17.391 1)	0.023 7*** (18.794 5)	0.034 1*** (25.016 2)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2 273 848	2 273 848	2 273 848	2 273 848	2 273 848	2 273 848	2 273 848	2 273 848
调整的 R ²	0.563 1	0.563 4	0.563 4	0.567 0	0.563 6	0.563 7	0.563 6	0.567 1
Within R ²	0.039 3	0.040 1	0.040 1	0.048 1	0.040 6	0.040 8	0.040 5	0.048 2

注:受篇幅限制,控制变量 *Affiliation*、*Marketization*、*Productivity*、*FirmSize*、*FirmAge*、*Soe*、*Foreign*、*Export* 的结果未列出。下表同。

2. 控制省份和年份以及行业和年份的交互固定效应

企业的选址可能是一种战略选择,是企业结合自身特质和地区特征对未来发展的预测,也就是说,省级便利化政策能够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结论可能是由企业根据地区的政策实施情况做出的“自选择”行为造成的。因此本文将省份-年份交互固定效应纳入模型,控制所有时变或非时变的省级层面影响因素,以此缓解自选择偏误。本文还加入了行业和年份的交互固定效应,用于控制行业层面的时间趋势。表4的回归结果显示,加入省份-年份、行业-年份交互固定效应后回归结果依然稳健。

表4 稳健性检验:控制省份和年份以及行业和年份交互固定效应

项目	(1)	(2)	(3)	(4)	(5)	(6)	(7)
<i>CGP</i>	0.097 8*** (39.384 9)	0.097 8*** (39.384 9)	0.082 1*** (23.981 2)	0.114 1*** (42.857 7)	0.098 4*** (39.568 0)	0.109 2*** (38.811 5)	0.119 7*** (32.728 1)
<i>CGP</i> × <i>LGP</i>	—	—	0.023 6*** (5.423 7)	—	—	—	0.005 0 (1.206 1)
<i>CGP</i> × <i>Affiliation</i>	—	—	—	-0.002 0*** (-39.668 2)	—	—	-0.001 7*** (-36.425 5)
<i>LGP</i> × <i>Affiliation</i>	—	—	—	—	-0.004 1*** (-9.029 2)	—	-0.001 9*** (-3.969 9)
<i>CGP</i> × <i>Marketization</i>	—	—	—	—	—	0.027 0*** (20.646 4)	0.025 5*** (20.091 7)
常数项	0.018 8*** (15.189 9)	0.018 8*** (15.189 9)	0.012 3*** (7.248 5)	0.024 4*** (19.416 4)	0.018 9*** (15.303 4)	0.011 4*** (9.058 0)	0.015 3*** (9.119 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年份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年份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2 273 844	2 273 844	2 273 844	2 273 844	2 273 844	2 273 844	2 273 844
调整的 R ²	0.569 1	0.569 1	0.569 4	0.571 8	0.569 2	0.574 7	0.569 1
Within R ²	0.049 4	0.049 4	0.050 1	0.554	0.049 6	0.061 6	0.049 4

3. 使用成立时间早于1994年的企业样本

为进一步考察基准结论的稳健性,从样本中筛选出成立时间早于1994年的企业样本,并检验在此样本中,是否仍能验证理论假说。这是因为,本文中省级便利化政策以及适用于特殊地区和特殊企业的中央便利化政策的实施时间均不早于1994年。因此,相比于其他企业,成立时间早于1994年的企业对于省份的选择是相对外生的。具体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①,中央、省级便利化政策的回归系数始终显著

^①第(1)至第(8)列的变量设定分别对应表3的第(1)至第(8)列。

为正,二者交互项系数为正但显著性降低,其他交互项的系数符号和显著性与表3的结果基本一致。由此可得,基准结论通过了企业“自选择”行为的内生性检验。

表5 稳健性检验:根据成立时间划分的企业子样本

项目	(1)	(2)	(3)	(4)	(5)	(6)	(7)	(8)
<i>CGP</i>	0.038 9*** (14.044 4)	0.039 2*** (14.108 9)	0.039 1*** (14.110 6)	0.049 2*** (14.831 0)	0.040 0*** (14.279 0)	0.039 7*** (14.202 6)	0.039 4*** (14.156 9)	0.049 0*** (14.810 6)
<i>LGP</i>	—	0.006 7*** (5.588 1)	0.006 8*** (5.580 8)	0.007 9*** (6.436 3)	0.013 9*** (6.917 1)	0.007 5*** (5.941 1)	0.006 5*** (5.575 7)	0.010 0*** (5.661 5)
<i>CGP</i> × <i>LGP</i>	—	—	0.000 1 (1.168 2)	—	—	—	—	0.000 1 (0.7086)
<i>CGP</i> × <i>Affiliation</i>	—	—	—	-0.000 9*** (-12.189 3)	—	—	—	-0.000 9*** (-11.833 7)
<i>LGP</i> × <i>Affiliation</i>	—	—	—	—	-0.004 4*** (-5.903 6)	—	—	-0.001 3* (-1.762 3)
<i>CGP</i> × <i>Marketization</i>	—	—	—	—	—	0.000 2*** (6.541 0)	—	0.000 0 (1.068 7)
<i>LGP</i> × <i>Marketization</i>	—	—	—	—	—	—	0.002 3*** (5.466 2)	0.001 5*** (3.802 2)
常数项	0.029 1*** (7.113 7)	0.025 4*** (6.125 6)	0.025 2*** (6.066 8)	0.036 3*** (8.221 2)	0.022 0*** (5.276 2)	0.024 4*** (5.862 9)	0.025 1*** (6.029 9)	0.034 2*** (7.614 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326 193	326 193	326 193	326 193	326 193	326 193	326 193	326 193
调整的 R ²	0.580 2	0.580 5	0.580 5	0.581 9	0.580 7	0.580 7	0.580 7	0.582 1
Within R ²	0.019 9	0.020 6	0.020 6	0.024 0	0.021 2	0.021 1	0.021 1	0.024 4

(三) 扩展性分析

1. 不同类型中央便利化政策的影响

根据政策侧重点不同,将中央政策分成审批核准、外汇管理和信息支持三类(图2),探究三类政策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差异化影响,回归结果报告在表6^①。可以看出,审批核准、外汇管理和信息支持政策均能显著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其中,外汇管理政策的效力明显强于其他两类政策,信息支持政策对于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较小。从协同性的角度,三类政策中,只有省级审批核准政策能够增强中央审批核准政策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

^①第(1)和第(2)列的*LGP*分别为省级政府发布的审批核准、外汇管理类便利化政策。第(2)列中固定效应已经包含了省级外汇管理政策。由于省级政府没有发布信息支持类的政策,第(3)列中的*LGP*与表2省级便利化政策的含义相同。

表6 中央便利化政策分类回归

项目	(1)	(2)	(3)
	审批核准	外汇管理	信息支持
<i>CGP</i>	0.125 3*** (46.871 7)	0.719 6*** (33.074 4)	0.037 7*** (18.493 7)
<i>LGP</i>	0.001 0* (1.652 1)	—	0.004 2*** (7.520 2)
<i>CGP</i> × <i>LGP</i>	0.000 2*** (3.402 9)	0.000 1 (1.281 8)	0.000 2 (0.690 3)
<i>CGP</i> × <i>Affiliation</i>	-0.003 1*** (-36.897 9)	-0.000 3*** (-5.635 2)	0.001 4*** (4.576 8)
<i>LGP</i> × <i>Affiliation</i>	0.002 5*** (5.600 6)	0.000 6 (1.176 2)	-0.000 6 (-1.585 1)
<i>CGP</i> × <i>Marketization</i>	0.000 1*** (4.761 1)	-0.000 3*** (-14.429 6)	0.000 7*** (6.213 8)
<i>LGP</i> × <i>Marketization</i>	0.000 7*** (6.028 5)	0.001 1*** (7.231 6)	0.001 1*** (8.588 9)
常数项	0.056 6*** (35.717 9)	-0.218 9*** (-32.423 3)	0.001 3 (1.066 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2 273 509	2 273 509	2 273 509
调整的 R ²	0.5649	0.4256	0.5414
Within R ²	0.058 6	0.030 5	0.007 6

2. 不同类型省级便利化政策的影响

省级政府根据中央便利化政策发布的跟进政策主要集中在审批核准和外汇管理领域(图2)。有关对外直接投资的审批核准,商务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均会发布相关政策进行管理,但侧重点存在差异,例如商务部会设置试点地区或者根据企业所有权性质来下放审批核准权限,国家发展改革委则根据对外投资项目金额来确定是否下放审批核准权限。有关外汇管理领域的政策,由国家外汇管理局统一发布。因此,根据中央政策的发布部门,对省级政府跟进发布的便利化政策进行分类。当省级便利化政策是跟进商务部发布的《关于做好境外投资审批试点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境外直接投资开办企业核准事项的规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时,变量 *LGP_MOC* 取值为“1”,否则为“0”;当省级便利化政策是跟进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境外投资项目申请报告示范大纲的通知》时,变量 *LGP_NDRC* 取值为“1”,否则为“0”;当省级便利化政策是跟进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深化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改革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在福建省进行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改革试点的批复》时,变量 *LGP_SAFE* 取

值为“1”，否则为“0”。表7中的回归结果显示，三类政策中，跟进中央审批核准规范发布的省级政策可以显著地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其中，跟进商务部审批核准规范的省级政策效力更强。从协同性的角度，三类政策中，只有跟进商务部审批核准规范发布的省级便利化政策能够增强中央便利化政策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

表7 省级便利化政策分类回归

项目	(1)	(2)	(3)	(4)	(5)
<i>CGP</i>	0.094 3*** (38.386 8)	0.095 3*** (38.688 3)	0.094 2*** (38.333 1)	0.096 5*** (38.927 0)	0.094 2*** (38.356 3)
<i>LGP_MOC</i>	0.007 6*** (13.456 1)	0.013 1*** (15.479 7)	—	—	—
<i>LGP_NDRC</i>	—	—	-0.000 4 (-1.475 6)	0.008 0*** (14.229 4)	—
<i>CGP×LGP_MOC</i>	—	0.000 2*** (3.644 1)	—	—	—
<i>LGP_MOC×Affiliation</i>	—	-0.006 6*** (-11.713 5)	—	—	—
<i>LGP_MOC×Marketization</i>	—	0.001 9*** (11.237 9)	—	—	—
<i>CGP×LGP_NDRC</i>	—	—	—	-0.000 3*** (-7.750 2)	—
<i>LGP_NDRC×Affiliation</i>	—	—	—	-0.006 2*** (-15.600 2)	—
<i>LGP_NDRC×Marketization</i>	—	—	—	0.000 1 (0.447 1)	—
<i>CGP×LGP_SAFE</i>	—	—	—	—	-0.000 3*** (-6.076 6)
<i>LGP_SAFE×Affiliation</i>	—	—	—	—	0.001 4** (2.029 8)
<i>LGP_SAFE×Marketization</i>	—	—	—	—	0.000 4*** (3.260 1)
常数项	0.017 2*** (14.657 0)	0.015 2*** (12.919 9)	0.020 0*** (16.910 5)	0.018 4*** (15.627 8)	0.020 0*** (16.997 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2 273 848	2 273 848	2 273 848	2 273 848	2 273 848
调整的 R ²	0.566 7	0.567 1	0.567 1	0.570 0	0.567 3
Within R ²	0.047 3	0.048 1	0.048 1	0.054 5	0.048 6

注：*LGP_SAFE* 和固定效应存在多重共线性而被吸收。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 结论

本文基于制度的视角,聚焦中央、省级政府颁布的便利化政策,刻画了政策支持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机制;在梳理便利化政策发展脉络、总结政策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中央便利化政策和省级便利化政策均能显著地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省级便利化政策能够增强中央便利化政策的正向影响。(2)各级政府颁布的便利化政策对隶属层级较低的企业的影响更加显著。(3)在地区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便利化政策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强。上述结果在改变解释变量衡量方法、控制省份-年份和行业-年份的交互固定效应、使用成立时间较早的企业子样本之后依然稳健。

(二) 政策建议

在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是重点也是难点,本文的研究具有深刻的政策启示:

第一,政策支持是引导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手段。中国目前的对外投资政策基本处于便利化的阶段,各级政府在执行便利化政策时,始终围绕着提高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便利化水平,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规范、引导、促进、调控等方面发挥着重大的职能作用。因此,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需立足于优化便利化政策环境,充分发挥中央、省级便利化政策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好地利用不同类型便利化政策的积极作用。

第二,强化不同层级政策的协调性,提高凝聚力。中央政府立足于国内比较优势和发展需求,着力提升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便利化程度。而地方政府选择性地响应能够促进地方经济建设的中央政策。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不一致,可能导致省级便利化政策的整体跟进速度较慢。在当前的权责体系下,这种矛盾带来的影响未来仍将存在,因而各级政府在制定政策时,需全盘考虑国家利益、省级特定优势和企业利益,找准三者的均衡点,加快探索中央、省级便利化政策的协调机制。同时,改进政策执行管理制度,及时收集并深度分析地方的反馈信息,促进不同层级政策间的良性互动与发展。

第三,重视不同企业潜在需求的差异性,推进地区市场化改革,提升对外直接投资领域的资源配置效率。在便利化政策的实施过程中,结合企业的特点优化政策效果,加强对隶属层级高的国有企业的支持,进一步降低隶属层级较低的非国有企业可能承担的制度性成本。推进地区市场化改革,为对外直接投资项目审批渠道的通畅创造条件,尽可能地让更多的企业享受到投资便利化领域的改革红利。

[参考文献]

- [1]陈岩,马利灵,钟昌标.中国对非洲投资决定因素:整合资源与制度视角的经验分析[J].世界经济,2012,35(10):91-112.

- [2]戴翔.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生产率悖论及其解释——基于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 南开经济研究, 2013(2): 44-59.
- [3]樊纲, 王小鲁, 马光荣. 中国市场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J]. 经济研究, 2011, 46(9): 4-16.
- [4]樊纲, 王小鲁, 张立文, 等. 中国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J]. 经济研究, 2003(3): 9-18+89.
- [5]洪俊杰, 张宸妍. 产业政策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微观机制和福利效应[J]. 世界经济, 2020, 43(11): 28-51.
- [6]姜广省, 李维安. 政府干预是如何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基于制度理论视角的研究[J]. 财经研究, 2016, 42(3): 122-133.
- [7]彭纪生, 仲为国, 孙文祥. 政策测量、政策协同演变与经济绩效: 基于创新政策的实证研究[J]. 管理世界, 2008(9): 25-36.
- [8]杨恺钧, 胡树丽. 经济发展、制度特征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基于“金砖四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 国际贸易问题, 2013(11): 63-71.
- [9]臧成伟. 市场化有助于提高淘汰落后产能效率吗——基于企业进入退出与相对生产率差异的分析[J]. 财经研究, 2017, 43(2): 135-146.
- [10]曾守桢, 余官胜. 行政审批简化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基于核准权下放试点的准自然实验实证研究[J]. 国际贸易问题, 2020(4): 19-34.
- [11]张为付. 影响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因素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 2008(11): 130-140.
- [12] BRANDT L, VAN BIESEBROECK J, ZHANG Y. Creative Accounting or Creative Destruction? Firm-level Productivity Growth in Chinese Manufacturing[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2, 97(2): 339-351.
- [13] BUCKLEY P J, CLEGG L J, CROSS A R, etc. The Determinants of Chinese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7, 38(4): 499-518.
- [14] CUI L, JIANG F. State Ownership Effect on Firms' FDI Ownership Decisions under Institutional Pressure: A Study of Chinese Outward-investing Firm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12, 43(3): 264-284.
- [15] DUNNING J H. Trade, Loc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 and the MNE: A Search for an Eclectic Approach[J]. The International Alloc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 1977: 395-418.
- [16] GAUR A S, MA X, DING Z. Home Country Supportiveness/Unfavorableness and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rom China[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18, 49(3): 324-345.
- [17] HELPMAN E, MELITZ M J, YEAPLE S R. Export versus FDI with Heterogeneous Firm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4, 94(1): 300-316.
- [18] HONG J, WANG C, KAFOUROS M.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Explaining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merging Market Enterprises[J]. British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5, 26(1): 45-62.
- [19] LEVINSOHN J, PETRIN A. Estimating Production Functions Using Inputs to Control for Unobservables[J].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03, 70(2): 317-341.
- [20] LU J, LI X, WRIGHT M, etc.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and FDI Location Choices of Chinese Firms: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Home Country Government Support and Host Country Institution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14, 45(4): 428-449.
- [21] LUO Y, TUNG R L. International Expansion of Emerging Market Enterprises: A Springboard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7, 38(4): 481-498.
- [22] LUO Y, XUE Q, HAN B. How Emerging Market Governments Promote Outward FDI: Experience from China[J].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2010, 45(1): 68-79.
- [23] SAUVANT K P, CHEN V Z. China's Regulatory Framework for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 China Economic Journal, 2014, 7(1): 141-163.
- [24] WANG C, HONG J, KAFOUROS M, etc. Exploring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volvement in Outward FDI from Emerging Economie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12, 43(2): 655-676.

Policy Support and Firms' OFDI —Empirical Analysis from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ZHANG Chenyan¹, ZHENG Wei², HONG Junjie²

(1. School of Economics,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Beijing, 100070;

2.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29)

Abstract: This paper combined central policies and provincial policies which were implemented during 1989–2013 and related to investment facilitation, integrating Annual Report of Industrial Enterprise Statistics and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DI) list from Ministry of Commerce from 2004 to 2013,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effect of policies on firms' OFDI. It is found that: first, both policies issued by central government and policies issued by provincial government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firm's OFDI; second, provincial-level policies can strengthen the positive effect of central-level policies on OFDI; third, the positive effect of provincial policies on firms' OFDI will be weakening when firms are affiliated to higher-level government; forth, in regions with higher degree of marketization, the policies play a more obvious role in promoting firms' OFDI. The findings verify the positive economic effects of policy support by improving investment facilitation, and provide feasible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further transforming government functions and deepening administrative reform.

Keywords: Policy Support; Facilitation Policies; OFDI;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Central Government; Provincial Government

(责任编辑 刘建昌)